



ZhongGuo XiaoShuo XiQu De FaXian

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

罗书华 苗怀明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ongGuo XiaoShuo XiQu De FaXian

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

罗书华 苗怀明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罗书华、苗怀明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752-7

I. 中… II. 罗… III. 苗…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②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7709

责任编辑:杜维沫 周绚隆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

罗书华 苗怀明 等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92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8.75 插页 2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6752-7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新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6年6月

前言

一、研究缘起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①。这句话用在小说、戏曲史学方面可以说尤为正确。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从文学边缘步入文学中心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学科建立的一个多世纪，也是小说史、戏曲史不停变化的一个多世纪。小说戏曲史之所以变而不居，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段时期内一些重要文献陆续被发现。它们的陆续发现，不断地丰富着小说戏曲学科的对象与内容，不断地更改着前此小说、戏曲论著中的错误与不当认识，不断地推进着小说、戏曲研究的前行。完全可以说，小说、戏曲文献的陆续发现是一百多年来小说、戏曲研究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没有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现在的中国小说（史）与戏曲（史）学科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远不会有这样实在与丰满。

遗憾的是，由于文献的发现是人的具体的历史活动，没有多少载籍记录在案，要想还原这个过程，无疑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此，目前相当繁荣的文学学术史论著，对此多是予以回避与省略。这样一种省略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在内，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小说、戏曲研究之流，而看不到小说、戏曲研究的发源；人们只能看到研究成果，看不到研究者本人；人们只能看到寂静的知识，却看不到研究活动中研究者歌泣感叹欣喜悲苦的生命体验；人们只能看到业已成形的学科，却看不到这个学科形成的最为艰难的一段过程。另外，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小说、戏曲研究奠定了

^①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页。

基础,同时也是研究的重大实绩,省略了文献的发现这个部分,不仅学科研究史缺少了半壁江山,也不足以展示学科研究取得的重要成绩,对于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苦努力的学者缺少应有的表彰,而对于还没有深入其中的青年学者则很可能形成误导,使他们不能充分了解文献发现在小说、戏曲研究中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1998年时下决心知难而上,将一百多年小说戏曲文献方面的重要发现作一番较为全面的清查与总结,撰著一部人文相兼的活生生的文献发现史、研究史,弥补中国小说戏曲研究史中这个被省略的重要环节。经过八年来的不间断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基本告竣。

二、主要内容

简单地讲,本书对一百多年小说戏曲文献方面的重要稀有文献的发现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是一部人文相兼的活生生的文献发现史、研究史。《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的“发现”包含三个层次的意义: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这些文献内在价值的研究与发现;小说戏曲意识与观念的呈现与发现。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包涵,合为一体。先有明确的小说戏曲意识与观念,才会有文献实物的发现与整理;文献内在价值的研究,又是文献实物发现与整理的延伸;文献内在价值的研究,又内蕴了小说戏曲意识与观念。这三个部分构成了全书的基本内容。由于全书在体例上以单个文献的发现为题,而不以时间为轴线,所以书名取《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而不称《中国小说戏曲发现史》。

全书首先对一百多年来海内外小说戏曲文献的重要发现作了较为全面、彻底的调查,从中遴选出四十余种重要和较为重要的文献发现作为对象,这些发现包括:《游仙窟》、《敦煌变文》、《红白蜘蛛》、《西游记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宋元讲史平话》、《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型世言》、《三国演义》嘉靖本、《金瓶梅》词话本、《姑妄言》、《轮回醒世》、《玉闺红》、《丽史》、《聊斋志异》稿本、《歧路灯》、《照世杯》、《红楼梦》脂评本、《无声戏》、北师大藏本《石头记》、罗贯中史料、施耐庵史料、吴承恩史料、张竹坡史料、曹雪芹家世史料、《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九宫正始》、《风月锦囊》、《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清升平署戏曲文献、《车王府曲

本》、《远山堂曲品剧品》、元本《琵琶记》、《白兔记》、《刘希必金钗记》、《天宝遗事诸宫调》、《西厢记》刘、徐、何本、《录鬼簿》与《续录鬼簿》、《礼节簿传》、《弥勒会见记》等。这些文献覆盖了小说戏曲发展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涉及到半部中国小说戏曲史。

学术史中的“发现”并不简单等同于首先“看见”和“看到”文献实物,它同时还要求“看到”文献的学术价值。学术史上的“发现者”,常常是指将某种久已湮没无闻的文献带入学术界视野的人。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总是与对这种文献的追寻探求、整理与研究分不开。正因为此,本书所说的“发现”,不仅是指人们探寻和偶遇这些文献实物的或艰苦、或离奇、或曲折的历程,同时也是指对这些文献内在价值的探索。本书不仅挖掘了小说戏曲稀有重要文献实物的发现过程,同时还清理总结了对这些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过程,描绘了它们从版刻、流传、湮没、发现以至走进研究视野的完整路线。

另外,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总是与一定的小说戏曲观念相联系。“再美的音乐,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也是没有意义的”,与此同理,再重要珍稀的小说、戏曲文献,在瞧不起小说、戏曲者的眼里,也只不过是烂纸一堆。小说、戏曲文献方面的发现,一方面固然需要机遇,更重要的还需要有一双认识小说、戏曲价值的眼睛。只有感觉到它们的重要性,才会有探寻这方面文献的意识与敏感,机会女神也才会格外垂青。而小说、戏曲的研究也总是体现出相应的小说戏曲观念意识。正因为此,本书不仅挖掘了这些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过程,清理总结了对它们的整理、研究过程,同时还尽力搜寻与勾勒出了在此背后的小说戏曲观念与意识。将全书各案例综合起来,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小说、戏曲意识的流变。

三、研究方法

《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既是文学研究著作,也是文献研究著作,所以全书尤为强调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强调一切从材料出发,从原始材料出发,以材料的调查作为研究的起始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基本方法和特点。当然,本书的“发现”并非只是指文献实物层面的发现,它同时还指价值与意识的发现,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注意到材料与理论的结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一切从材料出发,从原始材料出发,以

材料的调查作为研究的起始点,并非仅仅指对已有文献的调查、阅读与利用。由于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复原几十年上百年前的小说戏曲文献发现过程,对象是具体的人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寂静的典籍,这些活动有载籍记录,有的则在典籍之外,因此,本书还特地使用了实地勘查与人物访谈的研究方法。这种社会学与民俗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引进到本课题中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饶有意味,值得推广的方法。实地的勘查,总会给人一种不可替代的场境感,而与发现者、当事人及其亲友故旧的访谈,则不仅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不仅可以与文献资料相互参证,也为研究增加了浓郁的生命气息。这种方法的运用,应该可以为略显沉闷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打开一扇窗,引来一阵新鲜的空气。

四、理论创新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本书既是一本扎扎实实的文学论著,同是又是一本创新品格非常明显的论著。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书将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视为小说戏曲研究的源泉,以及小说戏曲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并以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个选择不仅拓展了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同时也拓展了学术史研究的思维空间。

文献的发现是人的具体的历史活动。本书以为,学术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知识的形成、发展与传承,同时还应特别注意:文献的发现者与研究者才是学术史的主体。学术史著中应该看到发现研究者的身影,看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为之喜,为之忧,为之悔,为之叹,为之发愤忘食,为之千金散尽,为之生死相许的强烈的生命体验。这对于现在的学术史理论与观念来说,也应该是一种理论创新。

对于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本书以为,完整的“发现”应该包含三个层面:文献实物的发现与整理,文献文本价值的研究发现,以及整个过程中小说戏曲意识与观念的呈现,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这种理解,应该也有一定的新意。

另外,本书将实地勘查与人物访谈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这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也是一次创新。

五、学术价值

在“研究缘起”、“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几部分中,已经对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作了阐述,下面再不惮重复地略作强调: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几千年时光里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人逐步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并开始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小说(史)、戏曲(史)学科。本书复原了四十余种珍稀重要小说戏曲文献的原始发现经过与研究始末,展示了小说(史)、戏曲(史)学术的动态增长过程,再现了中国小说(史)、戏曲(史)学科草创初建的艰苦历程,补足了小说戏曲学术史遗忘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虑到这是一项文字记载有限、有的材料甚至需要从当事人口中挖掘出来、此前研究者多不愿啃的硬骨头,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资料的散失,当事人及其亲友的逐渐故去,这些宝贵的发现过程可能很快会永远消失在时间的大海里面,本书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质,及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看得更清。事实上,本书采访过的发现者与当事人,有好几位在采访后不久就先后离开人世,说到此,不由不让人唏嘘感喟。

在对小说戏曲文献发现与研究的复原过程中,本书特别注重强调发现者在其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注重展示研究活动本身,以及发现者、研究者喜怒哀乐的生命体验。这对当前学术史研究中只重文,不重人,只重研究成果,不重研究活动的倾向也是一种纠正。而书中对研究者特别是第一辈研究者筚路蓝缕的功勋与艰苦卓绝的努力的表彰,对先辈们学术、生活和生命三合一生存方式的展示,对于今天的学人也应该有一定的启迪。

六、存在问题

对一百多年来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与研究作出全面的清理总结,无疑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本课题小组虽然已经作了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仍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全面,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不同的文献实物发现过程,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尽相同,有的发现在载籍中有迹可循,有的可以通过人物访谈复原,有的则既无载籍可按也无当事人可问。对它们的研究也有热

有冷。这就决定了本书各种文献的发现之中,实物的发现、文本的研究、小说戏曲意识三者的份量不尽平衡。再加上文成众手,风格与细节肯定有不一致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若以时机应当予以补正。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编

绪 说 小说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3
第一章 《游仙窟》	18
第二章 敦煌变文	21
第三章 《永乐大典》中的《西游记》平话残文	36
第四章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39
第五章 宋元讲史平话	50
第六章 《清平山堂话本》	65
第七章 《京本通俗小说》	70
第八章 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	77
第九章 《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	81
第十章 《型世言》	93
第十一章 《丽史》	100
第十二章 《轮回醒世》	104
第十三章 《玉闺红》	110
第十四章 《三国演义》嘉靖本	115
第十五章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	126
第十六章 《金瓶梅》词话本	142
第十七章 《姑妄言》	151
第十八章 日本尊经阁藏本《无声戏》	162
第十九章 《聊斋志异》稿本与抄本	171
第二十章 《照世杯》	178
第二十一章 《歧路灯》	182

1

第二十二章	脂本《红楼梦》	189
第二十三章	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手抄本	210
第二十四章	罗贯中生平史料	222
第二十五章	《水浒传》作者	232
第二十六章	吴承恩史料	237
第二十七章	张竹坡家世及生平资料	246
第二十八章	曹雪芹祖籍文献	253

下 编

绪 说	戏曲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279
第一章	《刘知远诸宫调》和《天宝遗事诸宫调》	307
第二章	《元刊杂剧三十种》	316
第三章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320
第四章	刘、徐、何本《西厢记》	333
第五章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341
第六章	“元本”《琵琶记》	357
第七章	明成化刊本《白兔记》	371
第八章	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	379
第九章	西班牙藏本《风月(全家)锦囊》	389
第十章	《弥勒会见记》	396
第十一章	车王府曲本	403
第十二章	升平署戏曲	409
第十三章	《录鬼簿》及续编	414
第十四章	《九宫正始》	423
第十五章	《远山堂曲品、剧品》	431
第十六章	《礼节传簿》	438
主要参考文献		443
作者简介与分工		446

上 编

绪说 小说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①。半个世纪前郑振铎先生的这句感慨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特点,具体到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来讲,更是如此。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重要史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是与中国古代小说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建立、完备以及发展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但它始终居于文学生态结构的边缘,被排斥于主流的文学殿堂之外,处于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大量的作品湮没不传,没有人专门用心搜求,因而也谈不上重大史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在梁启超等人的极力鼓吹推动下,小说一下被抬到空前的地位,成为启蒙救国的利器。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小说史研究开始奠基,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这也正如胡适先生于1923年所讲的:“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蔑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②由于此前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和应有的重视,因此小说史建立之初的当务之急就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中重大史料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同于诗文辞赋等文类研究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重要史料不断发现、整理和研究的过程。

应该说,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本身的内在需要才使先前自生自灭的小说史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原来不为人们注意的材料获得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也使原本单薄的小小说史变得厚重丰

①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页。

② 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实,它填补了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解决和纠正了先前的疑难与谬误,丰富和充实了已有的研究。而对已发现小说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影响着整个研究的格局和特色。如果没有近一个世纪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不可想象小说史的研究会有如今的盛况和局面。以下分别详述。

一

二十世纪之初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草创期,当时处于西学东渐、自新图强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人们关注的是小说的社会启蒙功能以及与西方小说的优劣异同,偏重于论的一面,因而小说史料的收集未能受到应用的重视。但还是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比如黄人于1908年发表的《小说小话》^①,虽属古代小说的简要评述,但也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小说专题目录,其中提及的许多小说今天已不可见,弥足珍贵。也有一些学者是出于对宋元旧本的珍视偏爱和个人兴趣,对说部的稀见珍本小说给予一定的关注,这虽非自觉的小说史研究,但对小说史料的搜集和保存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促进和开端。这也与清代目录版本之学的高度发达和较大影响有关,早在嘉庆、道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就将宋本《梁公九谏》和《新刊宣和遗事》收入其《士礼居黄氏丛书》中影刻出版。到了近代,也有不少学者注意搜求稀见的宋元小说,并刊印流传。比如,1915年,缪荃孙将其“避难沪上”时所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编入《烟画东堂小品》中刊印;1916年罗振玉、王国维将从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小字本影印出版,第二年,他们又将在日本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编入《吉石龕丛书》影印出版;1917年,董康又将《新编五代史平话》、《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醉醒石》等四种小说收入其《诵芬室丛刊》中。这一时期,古代小说的研究已经开始,但还不成规模,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所需要的学术基础和研究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五四之后,无论是小说自身的创作还是有关古代小说史的研究,经过维新变法之后近20年的模仿和探索后,开始走向建立规范、形成学科的成熟阶段。古代小说研究学科及其范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应该包括研究框架的构建和小说资料的完备这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以鲁迅的《中国

^① 黄人《小说小话》,载《小说林》第9期(1908年)。

小说史略》和胡适的系列考证论文为标志,它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范围及其研究范式,直到今天,小说史的研究仍深受影响。后者则以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代表,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史料基础,“为中国小说史立下目录学的根基”,“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①。这些著作也成为后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同时也激发了当时学术界对小说史料收集与研究的热情^②。

这一阶段,许多重要的古代小说材料不断被发现,对此,郑振铎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描述道:“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真要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每过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逼得你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在搜集、在研究。”^③也正是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才真正建立和完备起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④胡适先生也指出了这一时期古代小说引人注目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古小说的发现,尤为这个时期的特色。《宣和遗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话》残本的印行,《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来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说》的印行,都可以给文学史家许多材料。”^⑤因而该阶段小说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体现在研究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辨析。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治学风尚有关,有不少治小说史者是采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小说的,如孙楷第、余嘉锡等学者的研究。其间,早在世纪之初于敦煌等地发现的通俗文学资料经过众多学者初步的搜集、整理与刊布,得以流传,开始受到小说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中王国维写于1920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既是关于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将敦煌所发现文学史料应用于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敦煌所发现的

①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言,《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1页。

② 关于中国小说史料学的具体萌发与勃兴情况,胡从经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精彩而翔实的论述,可参看。

③ 郑振铎《幻影》,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页。

④ 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⑤ 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169页。